

# 能源“全领域”走出去是件好事情

——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



张国宝

■ 本报记者 蒋皓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在外国能源部长的眼中,他是值得尊敬的谈判对手。他处事稳健、体察民意,以敢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著称。对于任职期间的中国能源状况,他直言不讳:“任期内最大的遗憾就是电力结构调整还是缓慢,现在火电比重在电力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还是太高了!”

他就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国宝,在2013年中国经济年会上,他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能源从最初的油气走出去,到现在的全领域包括传统的油气,包括电、煤甚至于核电走出去,我认为都是一件好事情。”

《中国企业报》:您是否赞成能源企业走出去?

张国宝:我认为能源从我们最初的油气走出去到“全领域”——不光是油气,包括电、煤甚至核电也在考虑走出去,这是件好事情。国家电网等公司的基础力量是很强的,也有一定的财力,应当鼓励他们走出去。但有人顾虑把钱投到外面去可能会影响国内的电网投资,不太赞成走出去。20年前他们对于油气走出去也是这么说的,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投资就有人反对。

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电网等公司在国内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有能力走出去,顺便把我们的优势带出去,而且能取得比较好的经济回报,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出去呢!讲到钱的问题,国家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我们有三万亿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来让他们去投、去管呢?说到底,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中国企业报》:您觉得,如何从根本上杜绝能源企业的垄断?

张国宝:当时的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国家希望国网等公司鉴于它的垄断地位做好主业,不要搞辅业,辅业要分离出去。否则,即使这些公司说“我做的非常公正”,人家也会说你太不正。电力改革就是要求不要去搞这些非主业,而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但国网的思路就是“我需要”,因为需要变压器、开关等,就自己办个工厂。根据改革的精神,我是不同意这么做的。

《中国企业报》:能否谈谈两年前的广西试点提案?

张国宝:我作为政协常委的第一年就提过一个提案,但价格管理部门不同意。他们讲了四条理由,其中有一条理由是“水电的质量不好”,我一条条都驳斥了。我说,尽管水电有你们所说的那些问题,但也有优点。过去我们按水电建设成本定价的方式压得太低,应该适当提高,也体现对环保的重视。他们开始不同意,但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从广西试点开始。我也让步了,中国什么事情都要从试点开始嘛!广西有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按照这个精神,价格部门给政协回复了,还问我对他们的回复是否满意。我回答“很满意”,但最后却没有执行。为什么没有执行呢?当时文都发了,就是对对这个提案的一个正式答复。等文发了之后又说广西不同意,因为怕拉高广西的电价。

《中国企业报》: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已经过去了10年,作为过来人、亲历者,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张国宝:当时对电力体制改革比较有共识的首先是政企分开,把政府的职能从原来的国家电力公司里面剥离出来放到政府部门里面去;第二个是改革的模式,大家比较统一的想法就是厂网分开。发电企业和电网输配电业务在改革之前均属于国家电力公司,把原来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企业剥离出来,不再垄断,不再由一家公司办电,而是允许多家办电,多种所有制办电,引入竞争机制。

多家办电实际上是两个步骤:一

个步骤是把原来国家电力公司所属的发电企业剥离出来,但不是一家发电企业,而是组成了5家发电企业。5家可以相互竞争,根据你的服务,根据你其他方面的能力来进行竞争。另一个重大的步骤是,原来国家电力公司范围以外的发电企业也允许参与竞争,就是多种所有制都允许参与到发电领域中来,包括外资以及中外合资、民营企业,也包括非电力部门的企业来办电。例如香港华润、台湾地区的台塑,煤炭行业的神华、同煤集团,民营的协鑫、珠江,地方投资主体的河北建投、江苏国信等都办了一些电厂。估计现在发电企业上百家都不止,而原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五大发电公司所占发电容量的比例连一半都不到,这标志着多种所有制都允许参与到发电领域中来,形成了多家办电的竞争格局。

电力改革过程中,曾遇到不少难题,难题之一便是电网怎么办。由于在电网问题上争议很大,电力体制改革几乎搞不下去。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是由于当时已有从天生桥向广东送电,有了从西南部往广东送电的雏形。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展了一系列西电东送工作,在此基础上,已形成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联网的雏形。所以说,后来形成的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是各种意见,包括高层领导意见协调统一的结果,也是根据当时中国电网的状况作出的决定。

## 曾培炎:中国经济进入换档期

(上接第一版)

第四是“一次转移”。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有人甚至提出,21世纪是“亚洲时代”、“太平洋时代”。世界各国纷纷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美国提出了“战略东移”、“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这些都给国际大格局和国际关系带来深刻调整,也将给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带来重大变化。

### 中国经济的四个特征

曾培炎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具有四项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期”。过去的经济增长在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进行转型,从粗放外延式发展转到集约内涵式发展。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

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第二个特征是,社会发展进入了“矛盾凸显期”。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期,也是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姑且不论是否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问题,我国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也势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第三个特征是,改革进入了“攻坚期”。三十多年来,不断深化改革,是我们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但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内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显现,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已到深水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第四个特征是,经济增长进入了“换档期”。有观点说,中国的发展红利已经消失,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失速”的风险。也有观点说,中国还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完全可以支持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客观讲,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转型,长期保持

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可能不会是常态,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位数增长的“换档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尊重经济规律,更多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年均7%—8%的增长速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 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海外投资

■ 鲁守匡

改革开放至今,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工厂的进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

虽然外资对其控股企业实施的是全面的技术控制,这些企业基本没有核心技术,外资看上的只是中国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制造只是他们降低成本、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但是,正是外资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让中国企业就迅速借鉴并快速成长起来。而今,中国已经是世界市场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懂

得回报,应该承担起经济大国对世界的责任,对外投资绝非完全的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责任和义务。

比如,中国对非洲、亚洲不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尤其是对朝鲜、老挝、柬埔寨、赞比亚等国家,更多是属于援助意义上的投资,利益并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

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不会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就很担忧别国的竞争威胁。面对当年快速发展的苏联、日本和德国,美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进行遏制。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业超越美国时,美国就要求日本限制汽车出口。而曾经在债务危机中挣

扎的欧洲就积极欢迎来自中国的跨国投资。中国也通过欧洲投资获得了先进技术,解决了技术升级问题。中国企业雇用高素质的劳动力则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可谓一举多得。

不能因为我们在个别国家的投资失败个案而顾虑对外投资,要站在世界经济的高点上,把握全球经济发展的脉搏,一分为二地看待对外投资。一是注意风险控制,尽可能避免投资失败;二是敢于牺牲经济利益而谋求外交利益。

鼠目寸光是很难有大发展的。中国从引进来中获得了利益,又从走出去中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

必然之路。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失败,如果被几个失败个案吓倒,就谨小慎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从何谈起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所以,面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甚至是失败,我们只能在投资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从失败中总结教训,高瞻远瞩,一往无前,绝不后退,勇于担当大国责任,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繁荣世界市场。

热点

## 为处理农民工欠薪开辟“绿色通道”

■ 黄春景

为讨千元工资,得办9种证;“4次还嫌急,还有20多次的呢”……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尽管多部门联动推动“清欠”工作取得效果,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倍感无助与无奈,频繁遭遇“弹簧门”。艰难讨薪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些部门“踢皮球”式的工作作风不改。(2月3日新华网)

讨个千元的薪水也要提供9种证明,如此繁琐的程序,着实让人无语。如何破解讨薪难困局,当务之急亟须开辟一条便捷的“绿色通道”。记得曾有媒体报道九部委联合为农民工讨薪,此举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认可。但在笔者看来,要真正解决农民工讨薪难问题,关键还是要从优化制度入手,去掉不必要的繁文缛节,简化讨薪路径,搭建一个畅通有效的“绿色通道”。

所谓的“绿色通道”,即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减少中间环节,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不受侵害。不管哪个领域、什么时间、哪种行业发生问题,都能做到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的参与,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一套标准,为农民工讨薪提供便利。

不得不承认,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农民工讨薪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劳动监察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到企业检查工资发放情况等,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避免拖欠。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开辟“绿色通道”更显得刻不容缓。

在处理农民工讨薪的问题上,启动简易程序,缩短审理时间,依法快立案、快执行,做到“特案特办”,特别是对于涉及金额大、欠薪人数多的案件,要采取先援助后补材料的方式,第一时间为农民工提供更为及时、快捷的法律援助。

农民工讨千元欠薪被要求提供9种证明,我们无需刻意去放大个案的效应。因为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开辟了绿色通道,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关部门在各项劳动专项检查中都要要求,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要建立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绿色通道”,对涉及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案件,要减少环节、简化程序、特事特办、优先受理、快速处理。这样的“绿色通道”,为农民工维权带来了曙光。

说到底,我们不能把农民工讨薪难简单归结为法律意识薄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从本质上讲,还是程序过于繁琐的结果。要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既要增强职能部门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更需要简化程序创建“绿色通道”。

有了“绿色通道”,就能为纾解讨薪困境打开一个希望的窗口,就可以拉直农民工讨薪难的问号。

## 媒体真的夸大食品安全问题了吗?

■ 刘鹏

1月28日的广东两会上,该省政协委员李沛生在其提案中指出,食品安全涉及许多科学问题,报道要讲科学、讲证据。李沛生认为,近几年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展现不科学、不客观、不全面的现象,例如,“香蕉致癌”、“甲醛啤酒”、“毒蜜饯”等事件中,把“个案”推而广之到整个行业;动辄使用“有毒”、“致癌”等词语,夸大危害、制造冤假错案。(1月29日《南方日报》)

将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推到媒体头上,李沛生并不是首次,也不是第一人。尽管这种论调已被证实完全是“欲加之罪”,但一些人还是揪住媒体不放,这背后意味让人深思。

除了有些媒体人刻意炮制“纸馅包子”之类的假新闻外,每一次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其背后都隐含着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并非媒体捏造;而媒体的每一篇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也不至于会不讲科学。

以李沛生委员所举的“香蕉致癌”来说,事实上,媒体从来没有直接说过“香蕉致癌”这样的话。最早出现在2011年3月13日的相关报道是《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该文记者也只是写道:“有超过3333公顷的香蕉林感染了号称‘香蕉癌症’的巴拿马病,且每年以20%的速度扩大感染面积。”之后的3月14日,媒体又发表了后续报道《全国主要产区都发现该病》,并澄清说:“巴拿马病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任何危害。”

很明显,媒体坚守着新闻报道真实性、客观性的生命要素,保持着媒体的操守,并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故意的、人为化的夸大,更不会直接别有用心地指称:吃香蕉会致癌。其它类似报道也大体相同。因此,指责媒体夸大食品安全问题,明显是指错了对象。

至于李沛生委员所说的,“细节化地描写实质食品加工、渲染肮脏不堪的加工环境等,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夸大食品危害等,带来社会负面效应”,食品中有害物质含量少,“风险低就可以忽视”等言辞,更是不值得一驳,难道非得让媒体掩耳盗铃,把肮脏说成是卫生?难道对食品安全问题不该零容忍?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与生命安全,媒体的报道可能会引起民众误解和误会,我们要做的是调查事实、澄清问题、消除影响,而不是责怪媒体。